

東亞視角下的

近代中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東亞視角下的

近代中國

ISBN 978-986-00-6612-8



9 789860 066128

彭明輝 唐啟華主編

東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彭明輝、唐啓華主編

-- 初版.--臺北市：政大歷史系，民國 95 年

面： 公分

ISBN-13：978-986-00-6612-8（平裝）

ISBN-10：986-00-6612-4（平裝）

中國—歷史—近代(1600-)—論文，講詞等

書名 東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

主編 彭明輝、唐啓華

編輯 吳俊瑩、唐屹軒

封面 連清隆

出版者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六十四號

定價 新臺幣伍佰元整

承印者 鴻柏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七樓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13：978-986-00-6612-8（平裝）

ISBN-10：986-00-6612-4（平裝）

序

長期以來，政治大學歷史系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工作。雖然學校經費有限，仍努力尋求政府各相關部門的經費支援、補助。除了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學者來台客座及研究參訪外，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行，亦是其中重要一環。因此，歷任系主任不僅持續展開學術交流工作，而且接觸的範圍日漸擴大。《東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一書，即是以2005年10月22日、2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的「第二屆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做為主體，經過學術審查修訂的成果。

此次會議的舉辦，是由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部與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村田雄二郎教授研究室合力推動，而配合國父紀念館的經費支持，以「第二屆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為名召開。與會者除了兩個單位的博士班（畢業）學生之外，臺灣方面還有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警察大學的研究者，日本方面則有京都大學、一橋大學的研究者，以及德國波昂大學和韓國中央大學的學者參加，可算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

不過，《東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並不是收錄全部會議論文的專書。當研討會結束後，政大歷史系研究部組成編輯小組，經過村田教授的同意，作者修改後的論文送交論文審查委員進行匿名審查，審查通過的論文，則由政大歷史系負責編排、印刷，而有本書的正式出版。

從本書的內容來看，其中有關方法論及學術史的論文數量最多，包括：安井伸介的〈近代中國思想研究方法之探討：以道家思想與無政府主義的「個人自由」觀為例〉、王馬克的〈關於「nation」譯名的一些思考——伽達默的詮釋學給我們的啓示〉、石立善的〈胡適與入矢

義高——寫在書簡上的一段中日學術交涉史〉、竹元規人 的〈「思想史」與「歷史」——試論顧頡剛與傅斯年歷史研究的兩種不同路徑〉和李顯裕的〈博雅的通人：楊聯陞史學精神再探〉。其中既有細部的歷史考證也有宏觀的方法論檢討。在中國涉外關係方面，則有小軍的〈關於袁世凱政權勸說外蒙古取消獨立交涉之初探〉一文。至於國民政府統治中國大陸時期，教育史範疇有小川唯的〈國民革命時期中國的歷史與教育——關於1927年浙江大學成立過程〉、邱秀香的〈近代中日新式教育發展之比較——以實業教育為中心的探討(1904-1922)〉。至於中國國族主義的課題，則有小野寺史郎的〈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念日政策與國族主義〉。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時期，相關的論文則偏重宗教（政策）面向，有若松大祐的〈1950年代初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共同發起的三自運動〉和廣池真一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黨有關活佛轉世的政策〉。最後，在憲政史的範疇，則有中村元哉的〈1947年憲政與中國近現代史——國民黨的民權思想與國際關係——〉。整體而言，本書的內容不僅從東亞史的角度，檢視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各篇論文的取角，也呈現多元的樣貌。

本書的出版，是雙方合作協力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工作的重要成果。而在此次會議之後，主辦雙方已經合意繼續推動此一學術交流工作，本年10月14-15日（星期六、日），將在日本東京大學舉行「東大國際研討會：近現代中國與東亞的公共性」。個人衷心期盼此一雙方合作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能夠順利展開，繼續推動。

薛化元

2006/9/8 於政治大學

序

2005年10月、薛化元教授の招請を受けて、私は東京大学ほか日本の大学で学ぶ博士課程の大学院生十名あまりとともに台湾を訪れ、国立政治大学の教授・学生の方々と学術交流を行う機会を得た。私自身はこれまで何度も台湾の地を踏み、多くの学者と交流してきたが、大学院生の研究交流を目的とする活動に参加したのは初めてであった。東京大学にとっても、また日台のレベルにおいても、こうした形式の交流は、空前ではないにせよ、かなり珍しい——その意味では画期的な試みではなかったかと思う。

実は、われわれは当初、比較的こぢんまりとした研究発表会（ワークショップ）を予想しつつ台北に乗り込んだのではあるが、ふたを開けてみると、台湾側の周到な準備と手配により、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の名に違わぬ充実した研究集会に参加する榮に浴した。本論文集が刊行されるに至ったのも、当初の期待を上回る質の交流が実現したことの何よりの証左となるであろう。

顧みれば、ここ20年来、とりわけ1990年代以降、中国・台湾研究を取り巻く環境は激変した。資料の整理・開放が進み、研究者の往来が増加したというだけでない。研究の入り口に立つ若い世代——大学院の学生たちが、現地を訪れ、資料収集を行い、専門家の示教を得ることが、ごく日常的な光景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この間、台湾においては政治社会の大きな変化により、台湾研究や中国研究のあり方が大きく様変わりした。また、日本でもかつて研究者を制約していたイデオロギー対立が消失し、台湾研究を志す人々が激増した。これに応じて、会議・留学・研修・講学など、さまざまな交

流の機会もかつてなく増大している。

いまや、台湾研究でも中国研究でも、研究者を隔てる国境の壁はずいぶんと低くなってきた。しかし、だからといって、それぞれの国や地域で育まれてきた研究方法や問題関心がひとしなみ収斂してゆく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何より、日本人にとって台湾研究も中国研究も、一面で外国研究、他面で自国研究と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からである。さらに言えば、「国際化」の潮流の中でも、研究の場やあり方に規定された学問的特色（あるいは限界）というものは当然あるだろうし、研究者が置かれた状況による研究手法の違いもなくなりはないだろう。そうした違いは、学問的活力にとって見れば、むしろ肯定されるべきものだと考える。

過去と違うのは、そうした自身の研究上の特色や限界を、相手を眼の前にした対話的關係、言い換えれば相互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中で、確かめられる環境ができてつあることである。これは無条件に擁護されるべきことであると思う。とくに、これから研究を始めようとする若い世代の研究者にとって、そうした「自他」の關係を意識しつつ、自国あるいは自社会の知的伝統を更新してゆくことは決定的に重要になるだろう。本論文集が未来に向けた知的交流の礎になることを願ってやまない。

礼は往来を尚ぶ。昨年の成果を受けて、この10月には、われわれ東京大学駒場キャンパスにて、「近現代中国と東アジアの公共性——自由と統合をめぐる」をテーマとする二日間の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する運びとなった。昨年まかれた種が、今年はどのように芽生えるのか、主催者として大いに期待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

最後にシンポジウムの開催に当たりお世話になった薛化元教授、彭明輝教授ほか、国立政治大学の師生各位に心よりの謝意を表

する。

2006年初秋
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
村田 雄二郎

序*

2005年10月，本人與就讀於東京大學以及日本各大學博士課程的研究生十餘人，應薛化元教授之邀訪問台灣，得有機會與國立政治大學的各位教授與學生們進行學術交流。我本人雖然曾經多次前來台灣，與不少學者有過交流，但是參加以研究部的研究生之間互相交流為目的的活動則是第一次。無論對東京大學而言，或者是以日台的水準而言，這種形式的交流，即使不是空前，但也彌足珍貴——在這個意義上，不失為劃時代的嘗試。

實際上，最初我們預料這可能是一場小規模的研究發表會(workshop)，所以抱著這種心情來到台灣的。但一探究竟才知道台灣方面早有周詳的籌劃與安排，因此能參加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毫無遜色的研究聚會，深感榮幸。本論文集所以能夠出版，足以佐證實現了遠超過當初所預期的質的交流。

回顧這二十年來，尤其1990年代以後，有關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的環境有很大的變化。隨著資料的整理與開放顯著的進展，研究者之間的來往因之而增加。站在研究第一線的年輕世代——研究部的研究生們造訪當地，進行資料的蒐集，接受專家的教導等，已被視為很平常的事情。在這期間，由於台灣在政治社會方面起了很大的變化，因此台灣研究、中國研究的態度也隨之起了變化。其次，在日本曾經受限於意識型態的對立已經消失，有志於研究台灣的學者急速地增加。為回應此一趨勢，如會議、留學、研修、講學等各種交流的機會，亦史無前例地日益增大。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福慶先生譯。

目前，無論是台灣研究或中國研究，阻隔研究者的國界壁壘已大為降低，雖然如此，在各自的國家或地區訓練出來的研究方法或對問題的關心，還是未必能完全凝聚。總之，不論是台灣研究或中國研究，對日本人而言，一方面它被視為外國的研究，而另一方面也被視為本國的研究。進而言之，在「國際化」的潮流中，當然仍有受限於研究的場所或態度所顯現出來的學問的特色（或是限度），而且因研究者所處環境之不同，而在研究的手法上可能有差異之處，但是那種差異，如從學問活力的角度來看，寧可說是值得肯定的。

與過去所不同的是將自己在研究上的特色或限度，與對方透過面對面的對話關係，也就是說在互通訊息中才能構築確切的環境，這一點應該要無條件地加以擁護。尤其對於今後即將從事研究的年輕一代的研究者而言，一方面要自覺這種「自他」（自己與別人）的關係，一方面要對自己的國家或自己所處的社會的「知的傳統」加以革新，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期望本論文集能成為將來「知的交流」的基礎。

古語云「禮尚往來」。有鑑於去年的成果，因此今年10月間將於東京大學駒場校區以「近現代中國與東亞的公共性——關於自由與統合」為題，舉行為期兩天的學術研討會。去年播種的種子，今年將如何萌芽，身為主辦者殷切地拭目以待。

最後，即將舉辦學術研討會之際，對薛化元教授、彭明輝教授以及國立政治大學師生的周到照顧，衷心地表示謝意。

2006年初秋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
村田雄二郎

目次

薛化元	序.....	i
村田雄二郎	序.....	iii
	中譯序.....	vii
中村元哉	1947年憲政與中國近現代史 ——國民黨的民權思想與國際關係——.....	1
廣池真一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共產黨有關活佛轉世的政策.....	25
若松大祐	1950年代初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 共同發起的三自運動.....	49
小野寺史郎	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念日政策與國族主義.....	83
邱秀香	近代中日新式教育發展之比較 ——以實業教育為中心的探討(1904-1922).....	117
小川唯	國民革命時期中國的歷史與教育 ——關於1927年浙江大學成立過程.....	147
小軍	關於袁世凱政權勸說外蒙古取消獨立交涉之初探.....	185
李顯裕	博雅的通人：楊聯陞史學精神再探.....	205
竹元規人	「思想史」與「歷史」 ——試論顧頡剛與傅斯年歷史研究的兩種不同路徑.....	251
石立善	胡適與入矢義高 ——寫在書簡上的一段中日學術交涉史——.....	277
王馬克	關於「nation」譯名的一些思考 ——伽達默的詮釋學給我們的啟示.....	329
安井伸介	近代中國思想研究方法之探討： 以道家思想與無政府主義的「個人自由」觀為例.....	363

- 林志宏 從南社到新南社：柳亞子的民族和社會革命(1909-1929).....389
- 陳耀煌 抗戰前冀南地區的硝鹽問題
——兼評Ralph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一書.....419

1947年憲政與中國近現代史 ——國民黨的民權思想與國際關係——*

中村 元哉**

一、前言

本人在拙著《戰後中國的憲政施行與言論自由1945-49》(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年)一書當中，曾針對1930-40年代有關民主憲政之政治過程，從「言論自由」的角度，給予重新評價。在史料運用上，主要利用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圖書館特藏部、上海檔案館、國史館、黨史館和近代史研究所等處所收藏的檔案史料，企圖忠實地呈現當時輿論界和思想界的原貌。

而從其間之分析，我們證明國民黨的政策決策人士(例如陳布雷、孫科、王寵惠、吳國楨、王世杰、董顯光、馬星野、陳博生和程滄波等人)在權衡國內外的自由主義潮流下，力圖解除對言論之統制。因

* 本文為平成17年度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特別研究員獎勵費)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 日本學術振興會研究員PD，中央大學兼任講師。

此，雖然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特務機關和軍事部門任意地扼殺言論自由的舉動，但整體上來看，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中國言論界乃處於較為緩和的言論統制政策下，而得以跳脫出戰時體制之束縛，逐漸回復發展，終能享有一個多元化的言論自由。可惜好景不常，戰後的中國政治和社會情勢，隨著國共內戰惡化、米蘇冷戰態勢形成，以及宋子文所施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1946-47年)的失敗等因素，而在1947年春左右局勢又轉趨惡化。

但儘管如此，對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後這一時期，就是憲政實施時期，國民政府一連串朝向自由化和民主化之努力，卻不能加以忽視。何以故？

此乃因《中華民國憲法》的施行(1947年憲政)與其施行前後期間活躍一時的自由主義思想，不但承繼自清末以來民主憲政運動的思想遺產，更帶給1950年代以後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莫大的影響之故。其主要的影響，可從以下三方面來看：

1. 中國大陸：雙百政策·反右派鬥爭時所進行對當時體制的批判(儲安平·羅隆基等)，以及在現代中國改革論爭中對1940年代的重新反思和再發現(如費孝通·張東蓀·《觀察》雜誌和社會民主思想)。

2. 香港：藉由逃亡香港的部分國民黨人士以及所謂第三勢力，將1940年代自由主義思想引進當地，並促進其發展(如《大公報》的復刊等)。

3. 台灣：戰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自由中國》雜誌和雷震事件、台灣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下憲政的常態化)。

總括而言，1947年憲政在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領域中其意義已毋庸置疑，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更是令人不容忽視。

然而1947年憲政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並非僅此而已。例如在解釋國

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之際，以下所提這種觀點亦可成立。即國民黨政權在統治中國大陸時期，不管在制度上和理念上，確實建立以黨領政這種黨國體制，但若因此而斷言黨因此具有徹底全盤掌控政府、軍事以及社會的統治力量，卻又屬言過其實，而且隨著憲政的施行，更使其統治力量益形弱化。¹ 因此1950年代以後，有鑑於訓政、憲政時期導致統治體制弱化的歷史教訓，不但國民黨進行黨的大改造以及在那前後由蔣經國重新整頓軍情、特務組織，而同時面對即將施行憲政，共產黨也將民國時期所制定的法規制度全盤廢除，加強黨對社會的直接掌控。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從1950年代以後，不論國共兩黨皆不約而同地強化國家對社會的統制這種情況來看，1947年憲政所含歷史意義就益顯重要了。

綜合上述，我們可斷言「1947年憲政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具有其歷史意義」。而這項結論之所以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如前所述，在於國民黨、國民政府內部那股自由主義思潮的存在所致。

但是這股自由主義思潮本身卻並非不言自明的存在。因此，本人在此希望透過重新思考「1930-40年代民權思想到底產生了何種變化？」這個問題，來重新呈現國民黨、國民政府內部所存這股自由主義思潮的伏流。同時，在這裡本人除了特別重視其與國際情勢間發展的關聯性外，也將把問題的焦點鎖定在屬於言論、表達自由之一的新聞自由論上。² 如此乃是基於以下之理由。³

¹ 今後在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當中這樣的觀點將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² 探討國民黨、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思想，必須從(一)派系鬥爭(二)黨、政、軍關係(三)個人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思想等角度來進行多層面的分析考察不可。請參考中村元哉，《戰後中國的憲政實施と言論の自由1945-49》，(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但是本文並非以探析各項言論和行動之背景為目的，而乃是將這些言論和行動是如何在國際情勢發展的脈絡中進行為本

二、民權思想與國際情勢——以新聞自由論為例

清末以後的中國，與人權相比，更多的是對應於君權而大量使用民權這一概念。這裡所說的民權，雖然是否定封建專制的概念，但並不是所謂的自由平等和獨立的人權，而是最爲一種集團利益被強調。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國權取代了君權，成了與民權相對的概念，並逐步使得「民權作爲國權的侍女」這一觀點成爲主流。即就是說，這一民權概念，當把它與近代西方的人權概念相比較時，會發現它帶有與人權相對立的性格。⁴ 並且，對孫文民權概念的理解也一直是在這種思維模式中進行的。⁵

的確，以國權爲前提對人權進行解釋的中國的民權主義，其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的存在方式不同於國權以個人權利爲基礎的歐美的自由主義，其特殊性來源於這種思想與傳統思想（“公私”概念）的結合。⁶ 但是，這種中國特有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超越時空的全世界共通的現象。民國時期的民權也被看作是從放任主義到福利國家

文考察之對象。

³ 以下內容乃根據中村元哉，〈國民黨的新聞自由論與民權思想——從20世紀40年代國際情勢來分析〉，「紀念中國同盟會成立100周年暨孫中山逝世8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南京大學，2005年8月20-21日。

⁴ 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頁153。

⁵ Andrew J Nathan等著，齋藤惠彥·興招一郎譯，〈中國的人權〉（東京：有信堂，1990）；張灝，〈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二十一世紀》18（香港：1993·8）；溝口雄三，〈中國の公と私〉（東京：研文出版，1995）；陳儀深，〈中國國民黨的人權概念〉，收於李永熾、張炎憲、薛化元主編，《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新店：國史館，2004）等。

⁶ 溝口雄三，〈中國の公と私〉，頁75-77。